

过渡时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形塑及其意蕴

——以庐隐、石评梅小说为中心

王艳芳 于 迪

摘要:面对无可逃避的时代语境,庐隐和石评梅的文学表达具有一体两面的共性和个性,但最终都在“神话爱”和“英雄梦”的幻灭中留下女性解放先行者的空谷足音和累累创伤。经由自恋、恋物、恋尸到自虐的心理过程,从死亡叙述中“女体”的初次登临,到对身体禁忌和自戕心理的描绘,直到把这个身体搬上牺牲者的剧场,夹缠在自恋和自虐矛盾中的知识女性的自我形塑最终深刻影响到叙述者个人的生命方式,显示出过渡时代的女性悲情。

关键词:过渡时代;知识女性;庐隐;石评梅;自我形塑

在“五四”小说的人物谱系中,知识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同时扮演着书写者和被书写者的双重角色。作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受益者,她们冲破旧家庭旧道德的桎梏,接受新时代新思想的洗礼,并继而承担大众启蒙的重任。与此同时,她们又携带着来自旧时代和旧自我的诸多束缚和限制,以致在“五四”落潮的苦闷中狂呼悲吟、彷徨无路。以庐隐、石评梅为代表的作家,其小说的自叙传性质已为学界公认,研究者对于叙述者与其笔下女性人物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已达成共识,但对发生在叙述者和女性人物之间的角色暗示及其身份转换尚缺少进一步的关注。而实际上,叙述者不仅在作品中借助女主人公表达了她的生存、情感和思想,同时也借助其笔下一次次出场的人物,刻意地进行着自我形塑,甚至不惜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完成其生命实体的终结仪式。本文以此为视点,探讨过渡时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形塑及其意蕴。

一、死亡叙述中的“女体”

作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庐隐和石评梅呈现给现代文学的第一例人物不约而同地都是患病的女性形象。^①《一个著作家》中,女主人公沁芬因爱而不得,最终吐血死去。小说描写她的孱弱的病体:“哇的一声,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身体摇晃站不住了!”这之后不久就病重了,“玫瑰色的颊和唇,都变成了青白色,漆黑头发散开了,披在肩上和额上,很憔悴的睡在床上”。而男主人公邵浮尘因为贫穷不能带给她幸福,发疯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披散着一头乱蓬蓬头发,赤着脚,两

收稿日期:2016-09-17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王艳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于迪,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一个著作家》和《病》是庐隐和石评梅最早的小说,分别发表于1921年和1924年。

只眼睛都红了,瞪得和铜铃一般大,两块颧骨象山峰似的凸出来,颜色和蜡纸一般白,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骷髅差不多”。^①“鲜红的血”和“惨白的骷髅”由此成为两个深具象征意味的时代身体意象,在此之后极其频繁地重复出现在庐隐、石评梅的小说叙述中。以“鲜红的血”为指称的女体慷慨地将生命一点一点喷洒殆尽,在肺病患者常有的桃红色的短暂容颜里怀想着最后的浪漫感情;而以“惨白的骷髅”为指称的男体则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力量的萎缩和情感的匮乏,昭示着生命力耗尽之后的惨淡和恐怖。于是,淋漓的鲜红于惨白的底色之上呈现出更加刺眼的对照。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想象一方面与国民的体质状况相关,另一方面也和作者的国家想象相关:“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都是被视为‘病态’的……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话语的不断规训中定位自己的现代位置,并一度确信这就是认定自己落后的最合理的隐喻性理由。”^②女作家的相关书写于此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应和了时代的启蒙话语。

此外,尽管小说中的多数肺病患者都被描写为是因为生活的困顿和感情的纠缠而埋下病根的,但很难说这一病理现象背后没有特别的隐喻意义。西方19世纪以来的文学描写中,人们乐于用结核病来象征“病态之爱”——它被认为是忧郁的、敏感的、优雅的甚至超凡脱俗的病:“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此外,这种激情,尽管通常表现为爱情,但也可能是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激情。”^③由于这种热情,那些死于结核病的年轻人似乎不但感觉不到痛苦,反而有种特别的凄艳和浪漫。而庐隐和石评梅的病体写作亦可做如此理解。

正因为过度聚焦于病体的“浪漫”描写,小说忽略了其为争取恋爱自由所采取的行动。要么小说叙述几乎没有交代,要么小说中的当事人就根本没有采取行动,总之是坐等着任由爱的寂灭。如果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自我的反抗,那就是对肉体的自我摧残——让死亡在摧残中迅速降临,这一方面说明个人面对传统婚姻制度以及道德谴责的孱弱无力,“虽然人是具有理智的判断,博感的系恋;但同时人类又组织了一切的制度和习惯;你绝无勇气,把许多堑壁都粉碎了,如你心一样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初次登临公共场域的现代身体机能的先天匮乏,“病魔又乘着这黑暗的势力,侵入我这无抵抗的身体内”^④,死亡叙述作为一种反抗话语正是时代的症候,“死给你们看”的对于肉体的自我消灭成为对社会的激烈反抗以及逃匿行为,叙述者由此获得某种道德安慰,但病患者的言说终止了,反抗话语的表达可能就此无法前进。

事实确乎如此。《或人的悲哀》中病弱的青年女性亚侠跳湖自杀了,书信体小说的第一句就是“我的病大约是没有希望治好了”,绝望使她起了对生的厌恶:“我对于我的生,是非常厌恶的!”但也可以说,对于生的厌恶导致了其生理以至心理的疾病——这两者互为因果。于是,死亡的想象就变成一种审美观照:“我晓得那湖底下朱红色的珊瑚床,已为我预备好了!云母石的枕头,碧绿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⑤爱恋她的青年唯逸也因抑郁而死,于是死亡和情感发生关联:“虽然忧伤可以使人死,但是爱恋更可使人死,仿佛醉人死在酒坛旁边,赌鬼死在牌桌座底下。虽然都

① 庐隐:《一个著作家》,《庐隐选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36页。

② 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③ [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④ 石评梅:《病》,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⑤ 庐隐:《或人的悲哀》,《庐隐选集》(上),第181页。

是死,可是爱恋的死,醉人的死,赌鬼的死,已经比忧伤的死,要伟大得多了。”^①这里开始对死亡高歌,对于死的偏爱和迷恋日益彰显其形。这是对初涉公共场域的女体出场的过度注视?还是对自我的另外一种存在想象的迷恋?其实,这都不过是语言的障幕,对死亡的叙述欲望隐含着更深一层的潜在话语——渴望活生生的肉体被他人注视的内在焦灼感。对于肉体的虐杀和残迫不是叙述者的最终目的,她们是以肉体不断地患病、不断地濒临死亡和已经死亡的事实来唤起注意,从公众的视线焦点中去确认这是一具有性别的女体,尽管即将死亡;同时也从公众的关注中获得唤起和救助,藉此不但可以脱离死亡,而且或可新生。

但女体的死亡叙述(无论作为国族想象、反抗方式、情感期待抑或叙事策略)对于异性关注的期盼很快变为了失望。《兰田的忏悔录》中两个有着同样命运的女子,共同认识到男性社会权力体制的“固若金汤”,凭着彼此之间弱者的同情走到一起,发出“我们同作了牺牲品”的慨叹。兰田在弥留之际尚不忘记忏悔:“因为不被男子玩视和侮辱的女性,至今还不曾有过。我倘若能战胜病魔,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希望,可惜这希望太微弱了,我如果能与全世界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②《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不愿意从异性那里寻求安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因此她与朋友沅青之间由泛泛的友谊发展成了同性的爱恋,而沅青却抵挡不住世俗的婚姻规则退却了:“我们从前的见解,实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爱恋,终究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③丽石因此抑郁而死。于是,庐隐说:“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终日“浸在悲哀的海里”,为愿早点死去而作着“慢性的自杀”^④;《归雁》中的“我”在失眠、苦闷、抑郁、绝望等感情的折磨中,身体逐渐孱弱,但是“我不愿意爱惜这无用的身体,现在我就希望它一天一天的破损,等到那一天成了灰,我的灵魂便解脱了”,并且“我要疯狂,我要浪漫,我要热闹我自己,同时我也要蹂躏我自己,总之越快收束越好!”^⑤时代爱情的苦闷使她们迁怒于自我的身体,乃至不惜以身体的被虐为代价来补偿情感的不足。

不仅如此,20世纪初年知识女性受教育权利的获得,使她们在自我觉醒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于世界的分裂性的认识,既然现实的一切不可撼动,既然死亡的女体都不能牵动古老社会的怜悯之心,她们只能去书本中、知识中寻求答案,于是纷纷患上所谓的“哲学病”:

知识告诉我,不可自困!然而我的精神,从此失了根据。我觉得人生真太干枯!^⑥

被知识苦缠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这时的心,彷徨到极点了!^⑦

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⑧

现实世界愈是分裂至无法调和,她们愈是要到书本中寻求答案。“人生的悲剧,都是生活和思想的矛盾所造成。理想和现实永远不能调和,人类的痛苦因之也永无休止”^⑨,当她们将身体的话语搁置,专在知识中求解答案的时候,出现在她们眼前的却是一个严重倾斜以至两元对立的分裂世界:“在

① 庐隐:《父亲》,《庐隐选集》(上),第254页。

② 庐隐:《兰田的忏悔录》,《庐隐选集》(上),第305-306页。

③ 庐隐:《丽石的日记》,《庐隐选集》(上),第192页。

④ 庐隐:《庐隐自传》,《庐隐选集》(上),第593页。

⑤ 庐隐:《归雁》,《庐隐代表作》,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

⑥ 庐隐:《或人的悲哀》,《庐隐选集》(上),第179页。

⑦ 庐隐:《或人的悲哀》,《庐隐选集》(上),第181页。

⑧ 庐隐:《海滨故人》,《庐隐选集》(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⑨ 石评梅:《白云庵》,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205页。

我眼帘下的宇宙,没有完全的整个,只有分析的碎屑;所谓奇丽,只有惨淡;所谓愉快,只有悲哀。我以为世间一切奇丽快乐都是虚幻,而悲哀惨淡,确是宇宙的主宰,万古不灭的真理!我对于生,感不到快乐,只有悲哀,同时我又怀疑着宇宙中的一切。”^①于是,泪、愁、病、血、恨、弃、死几乎构成了庐隐、石评梅小说的基本意象;惆怅、伤感、迷惘、悲哀、创伤、分裂、冲突、绝望也便成了其作品的主要情绪:“宇宙布满了罗网,任我百般挣扎,努力的追寻,而完整的生命只如昙花一现,最后依然消逝于恶浪,埋葬于尘海之心。”既然生命的存在如此痛苦和无望,躯体的存在就变得令人憎恶:“——在色相的人间,只有污秽与残刻,吁!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总有一天,我将焚毁于我自己郁怒的灵焰,抛这不值一钱的脓血之躯,因此而释放我可怜的灵魂。”^②女性自我所拥有和暂时掌管的似乎也只有自我的身体了,所以,任意处置这个身体就成为唯一可以掌握的话语权力。

或许这只是因为她们暂时将有关身体的话语搁置,而只专注于精神上的发展,但身体的事实存在在毕竟无时无刻不在视阈之中,对身体的偏离又必然造成精神上的苦闷和冲突,因而她们有意无意间总是要用文字去消灭这个身体,藉此实现与时代话语——启蒙理性的对接。可以想象,久久浸淫在情感和理智、身体和精神、知识和生活的分裂的世界中,脆弱的女性个体何以承受?“我是愈想超脱,愈自沉溺,愈要撒手,愈自系恋的人,我的烦恼便绞锁在这不能解脱的矛盾中”^③,她只希望这女体受难的旅程尽快结束:“我不诅咒人生,我不悲欢人生,我只让属于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闪电,都像流星。我时时刻刻这样盼着!”^④所以,那尚且活着的已经不是生命,“淡粉的翼纱下,笼罩的不是美丽的蔷薇,确是一个早已腐朽了的少女尸骸!”^⑤这具被冰冷和黑暗杀戮已久的女体,触目地横亘于过渡时代。

二、身体的禁忌与自戕

肉体的自我消灭过程殊为不易,况且在最初的文字表达中,无论庐隐还是石评梅,都还只是在语言层面表达对身体的自恋和自虐,尚未发展到后来的对真实的身体的自戕。恰恰是在她们将病弱的女体推向公共领域的时候,这个女体本身却连她们自己都不敢正视——所有欲望的要求都在禁忌之列。庐隐小说《沦落》中的女学生松文感恩于海军军官赵海能而委身于他,这是传统社会中女性出让身体的原型模式,但有个少年爱上了松文,“她觉得那少年对她十分的真挚,或者能原谅她一时的错,而终身包涵她……但她一转念间,又觉得自己的测度靠不住”,这里的欲语未语包含着松文对自己不复处女之身的疑虑。果然,由于少年对传统婚姻女体纯洁性的要求,她最后还是被抛弃了,只因为在少年心目中,“他的爱神已不是含苞未放的花了,他怀疑着想,这大约是梦吧!世界上哪有这种可惊异的事呢?她娇羞默默,谁说不是处女的美呢……竟有这种事吗?”^⑥他仿佛失足到封锁着的冰窟里去,心身都冷得战栗了——只因为她已经不是处女。处女禁忌作为“一种古老的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原型,实质是千百年来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价值心理的强制性塑造,日久天长成为女性的心理积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内化为女性自己的价值心理”^⑦。所以,可怜的松文唯有哀求万能的上帝来接引她了,唯有以死来了结这不洁的身体。

同样,庐隐的《归雁》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一段恋情的开始和终结。丧偶后的纫菁在彷徨和颓废

① 石评梅:《病》,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152页。

② 庐隐:《夜的奇迹》,《庐隐选集》(下),第21页。

③ 石评梅:《涛语》,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④ 石评梅:《母亲》,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散文》,第7页。

⑤ 石评梅:《素心》,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散文》,第40页。

⑥ 庐隐:《沦落》,《庐隐选集》(上),第221页。

⑦ 刘思谦:《“娜拉”言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中饮酒买醉,痛苦的失眠之夜,她望见了丈夫的遗像:“万劫千生不可弥补的一个缺憾!唉!元哥,我的青春之梦,就随你的毁灭而破碎了,我的心你也带走了!但是元哥你或者要怀疑我吧!有时我扮得自己如一朵醉人的玫瑰,我唱歌我跳舞……这些,这些,岂不都可以使你伤心吗?但是元哥这只是骗人自骗的把戏呵!”^①这是盛宴歌舞之后对自我的追悔?还是对丈夫的自我剖白?显然,这里除了浓郁的自恋情结外,忠实于已死的丈夫还是放纵自我的情欲,成为交缠于内心的突出的矛盾。这足以再次说明庐隐、石评梅笔下女性自我灵与肉的分裂、心和性的隔膜以及两者不能统一的苦痛,它意味着貌似获得了自我解放的知识女性,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自我心智上有所解放,而与此密切相关的身体的解放则始终处于悖离状态。此种分裂和失衡进一步造成其精神上的苦闷、哀愁、自恋,也是造成其极力压抑身体欲望并将其诉诸行动的深层原因。这段内心独白显示出典型的矛盾心理,表明灵和肉的分离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和饥渴,故而女主人公产生这样的臆想也就不足为奇:“我忽然看见藤幔背后,有一双洁白而柔嫩的手,我不问他是谁,我发狂似的跳了起来,将他牢牢的捉住,唉!这是怎样柔滑的!……不知哪一个英雄的手呵!我将他这双手按着我剧烈跳动的心房,同时我希望他低声地叫我……温柔地叫我……”^②然而美丽的英雄却消失了。这个幻影或梦境是女主人公真实的内心显露,想象中的男子不但有着洁白、柔滑的双手,而且是个温柔的英雄。

可是,时代是否为她准备好了这样的男性呢?事实恰恰相反。对于现实中的石评梅来说,问题也许并不复杂,只不过由于后人的附会,一切都因扑朔迷离而变得神秘进而演化成为爱情的神话!石评梅在《涛语》中有过对恋人高君宇的真切描写:“他的唇枯烧成青紫色,他的脸净白像石像,只有胸前微微的起伏,告诉我他是在睡着。”^③这分明是“尸”的意象,后来再去看他,依然是忧丝紧缚的枯骨,空虚不载一物的机械,当形销骨立骨瘦如柴的“他”用凹陷的眼珠望着“我”时,我“真觉怕他”,而且“浑身都出着冷汗”,可见其先前作品中对于死的描摹终究还只是出于想象,当她与真正的死亡面对时不免忌憚。同时这也透露出另外的信息:除了诸多的个人原因外,石评梅之于高君宇示爱的迟迟未复,这种真切的感受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当她面对一具活着的“尸身”时,是否还会有浪漫的形象以及唤起身体注视的渴望呢?

令人迷惑或深思的地方就在于:石评梅一代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所持有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女体观——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充满禁忌的,时时处处讳莫如深。许多习俗和仪式,女人不被允许参与;而在另外一些特殊的场合,被献祭的则必须是美丽的处女。这都证实着女性身体的被侮辱和被歧视。作为过渡时代的女性,石评梅的身体观无疑受到封建文化的深度熏染;但毋庸讳言,第一次恋爱的失败也对她的女体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现在已经无法具体推究她在这次恋爱过程中的身体参与和介入程度(指觉醒和生长意义上的身体成长),但可以了解到的是,此后的石评梅开始对异性万念俱灰,勘破爱情,摒弃爱情甚至人生。当然,这里也不能够排除其他客观的因素,如石评梅笔下写到的世界黑暗、人类丑恶、前途渺茫等;又如“五四”落潮后的普遍低落情绪,这在石评梅、庐隐等人笔下都有相当多的描述;甚至还包括她们对“五四”时代启蒙与解放运动的朦胧的怀疑,只不过这怀疑的声音得不到支持和响应,而个人又无法寻觅到出路,于是只好自我消磨“英雄”的情怀。恰当此时,高君宇出现在石评梅的生命中。高君宇的贫弱苍白让石评梅有所警惕,但他执着的爱情表白以及石评梅对于英雄的敬重都使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虽然石评梅没有亲眼目睹高君宇的弥留一刻,但他的遗物和后事皆有石评梅整理和参与,高君宇的影响在她的

① 庐隐:《归雁》,《庐隐代表作》,第296-297页。

② 庐隐:《归雁》,《庐隐代表作》,第356页。

③ 石评梅:《涛语》,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散文》,第73页。

生活中逐日扩大。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亲历高君宇逝去的过程,那情形在想象和追忆中就越发沉痛、逼真;而且,石评梅从高君宇的日记中得知,正是由于她拒绝了他的感情才使得他再次病倒,这进一步促使她陷入其中无以自拔。

于是,个人的一系列不幸和忧患的时代氛围都使“死祭”成为石评梅唯一能够选择的情感和生命寄托,作为个体生命载体的女体只能作为祭品而存在。曾经鲜活的身体,在还没有呈现出它的活力、温热以及荡漾的激情之前就已经冷却,此后它只能是一具“尸身”——没有温度和美感,思想和情感也只在“尸身”的阴影中存在。是故,石评梅的身体及其笔下人物的身体在其有生之日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既然温热的身体是不可爱的,并无可体现其为温热的优势,那就将它冰冷下来,冰冷的“尸身”由此成为一种眷恋和信仰。这便是这位女作家由自恋、爱物到恋尸书写的心理过程。女主人公在世界之中看见了自我,在自我这里却寻找到疾病和死亡。

此外,特殊的心理情结和创伤也使庐隐、石评梅一代女性备尝思想超前者的孤独、悲哀和困窘。第一次恋爱的失败在石评梅的内心烙下了深重的伤痕,失败之时也是向着传统回归之始。由于受制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她内心的处女禁忌以及对同性命运的同情(不愿另外一个女性如她一般遭到背弃的命运),使得石评梅坚决拒绝了高君宇的求爱。在所有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她内心深处的那个“鬼影”——“为了某种虚幻的道德的完满和自我的纯洁感,她半是真诚半是欺骗地否定了自己与生命同在的性爱欲望,向着无物之阵拱手交出了爱的权利”^①。对于传统的两性观念的潜意识接受和皈依,促使她不愿意再以自我的身体实践“二次革命”,何况在已经变换了的时代环境中再没有先前的气氛、潮流和力量。其时,石评梅对母怀的皈依心态也是其早期反叛思想和行为的一种内在回归。她曾说过:“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将来死去也是父母赐我的璧洁的身体。”^②这与其说是自我的剖白,不如说是对传统的身体观念的屈服性认同。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就可以理解了。当高君宇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尸身,在死亡神话中作为英雄埋葬于陶然亭畔,石评梅原本就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继续扼守她内心的两性观念了。然而,此后石评梅对于高君宇的无论文字还是现实形式的系念反倒博得了世人更多的同情和景仰。在心理和情感上,石评梅不再需要承担世俗的风险,反而变得相对安全,尽管两人并没有任何法律形式的婚约。此后她就只是一个俗套爱情故事的悲哀遗存——高君宇的未亡人。石评梅这一未亡人身份的获得充满着悲哀和反讽:一个沐浴着“五四”自由和解放风尚成长起来的女性,在时代的低潮和个人的际遇中,居然走向了这么一个带有戏剧性的命运转折和结局。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实际上以未亡人身份存在着的石评梅,不但在形式上恪守本分,献祭、拜念、哀哭、上坟,而且在身体上也践行着未亡人的本分——在最短的时间内虐待这个身体,破坏这个身体,促使其尽快地毁灭,以成就真正的殉夫——正如她在散文和书信中一再声明的:和高君宇一起埋葬在陶然亭,去殉那早已冰冷了的尸身。同时,也藉此完成从文本到实体的对身体的厌恶以至虐待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带有多重意味的悲剧,既令人震撼也让人悲哀。石评梅以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祭奠了“五四”,她无法摆脱个人的怀疑和失落,只能以对自己生命和肉体的磨折来尽快逃离深沉的时代痛苦。石评梅的自我形象与其说是为时代话语所塑,还不如说是为自己所塑,她按照自己的心愿塑造了自己的归宿。只不过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促使她进行自塑的观念其实都来自于男权文化的陈腐力量。

① 刘思谦:《“娜拉”言说》,第74页。

② 李健吾:《悼评梅先生》,卫建民:《魂归陶然亭——石评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三、自我观看的牺牲者

从一开始的将“女体”带进文学的公共领域,到实现对这个“身体”的虐杀,在庐隐、石评梅的笔下并不是一个直线过程,其间,女性知识分子还经历了从“神话爱”到“英雄梦”的转圜及其再次失落,直到最终成为一个自我牺牲者。很多研究者曾为发现庐隐、石评梅后期作品中英雄书写的革命话语而振奋^①,而实际上,英雄书写与死亡叙述是对应存在并呈因果关系的叙事语码,最终迸发出的烈士雄心是无路可走后的梦呓,是有温度的身体在彻底冷却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事实是时代话语对女性生存无力也无暇关注,女性身体则在渴求与无望中徘徊了许久,自怨自艾的青年最终决定走上战场,而战场上的革命者也难免绝望,在开枪自杀之际忽然醒悟道:“我不能这样死,至少我也要打死几个敌人我再死!这样消极者的自杀,是我的耻辱,即使我现在这样死了便该早死,何必又跑到这里来从军呢!”^②这几乎是从实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自杀倾向的心理治疗了。从1927年5月开始,石评梅确实写下了一系列“革命小说”,折射着一个连贯一致的叙述者的存在。如《红鬃马》追悼英雄之死:“我依稀看见梦雄骑马举鞭指着一条路径,这路径中我又仿佛望见我陨落之希望之星的旧址上,重新发射出一种光芒!这光芒复燃起我烬余的火花,刹那间我由这个世界踏入另一世界,一种如焚的热情在我胸头缭绕着——燃烧着!”^③《白云庵》中的老英雄激励了消沉已久的女子,使她发出这样的誓言:“我还是个青年,我不希望我为了自己的悲愁就这样悄悄死去的。我要另找一个新生命新生活来做我以后的事业。因之,我想替沉没浸淹在苦海中的民众,出一锄一犁的小气力,做点能拯救他们的工作,能为后来的青年人造个比较完善的环境安置他们。”^④这表明石评梅的思想确实在发生转变,并且这革命的行为并不盲目,而是有一定的观念作指导。其中甚至包含着对革命动机的思辨:革命虽是从解除个人的痛苦出发,但结果却应是为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不能计较自己的所得,因为革命不是投机求利的事业。所以,不必为了革命的不能即刻成功和见效而失望。但如此这般的描写依旧让人摆脱不了这样的感觉:她还在为自己的终究不要对社会完全失望寻找理由。而哪一位叙写的英雄不是作者的自我形塑呢?只不过人称转换而已。

果然,几乎就在塑造和膜拜英雄的同时,对英雄行为和动机的质疑也开始了:“看起来中国目前似乎都是太积极了,‘希望’故意把人都变成了猛兽,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烈火燃烧起来!鲜血喷洒出来!尸体堆集起来!枪炮烟火中,一切幸福和安宁都被恶魔的旗帜卷去了。这几乎退化到原始的世界,我时时都在恐怖着!暴动残杀,疯狂般的领袖,都是令我们钦佩敬爱的英雄吧!只是他们的旗帜永远那么鲜明正大,而他们的功绩却永远是这样暗淡悲惨呢!”^⑤这里显示出对时代共名式话语的反思。在作于1927年7月的《归来》中,石评梅进而借子凌之口发出与革命者的主旋律绝然不同的声音:“如今虽然是获得一时的胜利成功,不过在人类永久的战斗里,他只是一个历史使命的走卒,对他自己只是增加生命的黯淡和凄悲!”^⑥庐隐作品中的英雄情结也由来已久,她在女高师读书时被称为“四公子”之一,这种自我认同的形塑,即带有很强烈的英雄情结。她在自传中也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⑦《秋风秋雨愁煞人》直接书写英雄,但她也清醒地意识到:“我往

① 这方面的论述,前者如钱虹的《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庐隐和她的创作》,后者如刘思谦的《石评梅:生命的燃烧》。

② 石评梅:《匹马嘶风录》,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223页。

③ 石评梅:《红鬃马》,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183页。

④ 石评梅:《白云庵》,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205页。

⑤ 石评梅:《冰场上》,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散文》,第149页。

⑥ 石评梅:《归来》,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190页。

⑦ 庐隐:《我的自传》,《庐隐选集》(上),第579页。

往想作英雄,——但此念越甚,我的哀愁越深,为人类流同情的泪,固然比较一切伟大,不过对于自身的伤痕,不知抚摸惘惜的人,也绝对不是英雄。”^①包括秋瑾在内,为什么近现代知识女性有着如此强烈的英雄情结?这和以男权观念为主导的时代话语倡导不无关系:“五四以降的男性知识分子,巧妙地使一代代的新女性加入其阵营,认同最初由他们所塑造为反传统的娜拉形象,却规避了自古至今由男性掌控的国家机器对两性秩序而应负的责任。男性群体从来不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批判或控诉对象,而‘男女平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则是将女人的女性特质抽离,使女人变成和男人一样的人。”^②所以,女性自我在尚未解放和无法真正解放的尴尬中,被席卷进时代英雄的共同式话语中,究其根本还是受到了当时的知识话语或者说是启蒙话语操持者的引导。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有“过渡时代”的著名论述,过渡时代既是希望时代,又是恐怖时代。他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认为经“过渡时代”而达“黄金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故激进革命党提出“破坏时代”“暗杀时代”以及“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提出“自杀时代”皆具有“希望”与“恐怖”的双重面相,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在自己所在的时代无法获得,人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另一个更有希望的时代的来临。”^③自杀情结和行为似乎成为时代有志者自我实现的方式。与此相关,社会舆论中也流行着一种英雄崇拜情结,即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谈到“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告求英雄”^④,人人皆欲为成为过渡时代之英雄慷慨舍身。作为“五四”风潮的余绪,“由‘牺牲’带来的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情绪一直真诚地弥漫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成为运动的有效催化剂和个体价值的最佳支点”^⑤,从庞杂的史料中,我们发现了对牺牲的向往和召唤,发现了人们更愿意以某种方式塑造自己以及最终如何贯彻了自己的实践热情,这些都曾成为思想文化界鼓噪一时的时代共同式话语。

当然,庐隐和石评梅对“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理解并非仅此于此,还包含有更为深刻细微的性别关切和内涵。庐隐《兰田忏悔录》中的兰田在“我们同作了牺牲品”的觉悟后说:“爱情真是混世的魔王,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作了它的牺牲品。”《时代的牺牲品》则是以女主人公秀贞的话语对这一命题正面展开述说:“我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但是与其使我为他憔悴而死,还是牺牲了我以成全他吧!”讽刺的是,享受着秀贞的牺牲,秀贞的丈夫却是另娶了漂亮善交际的新妇,叙述者不得不感慨:“在这新时代离婚和恋爱,都是很时髦的,着了魔的狂热的青年男女,一时恋爱了,算不得什么,富于固执感情的女子,本来只好作新时代的牺牲品……”^⑥可见,庐隐所叹惋的时代黑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黑暗,女作家“一方面看到了当时没有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带给出走的娜拉们的痛苦,另一方面她们对作为现代性话语操持者的男性身上,甚至现代性爱话语本身所有的父权意识也有疑虑”^⑦,在这个倡导个性解放的时代,一切准则和话语实际上更多地是在为男性实现个人私利和满足本能欲望提供契机。庐隐、石评梅等“五四”一代的自我意识觉醒者最早表达了她们的怀疑,她们清醒地意识到女性正在成为这个过渡时代的牺牲品。所以,她们笔下有关姊妹情谊的书写,不仅仅是在现实面前的屈服和退避,也不仅仅是个人自我认同的投射,而是同时还包含着女性受侮辱者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性别秩序的诉求和希望。

① 庐隐:《愁情一缕付征鸿》,《庐隐选集》(下),第13页。

② 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3年版,第391页。

③ 黄东兰:《身体心性 权力》,第157页。

④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⑤ 黄东兰:《身体心性 权力》,第175页。

⑥ 庐隐:《时代的牺牲品》,《庐隐选集》(上),第320页。

⑦ 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于是,出走后的女性如何真正完成妇女解放成为需要考量的问题之一:“现在我国的女子教育,是大失败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这班人简直是高等游民。”^①究竟是与所谓的志同道合者结婚走入平庸琐碎的生活,还是怀抱独身主义继续事业的追寻?这过渡的时代耗尽了众多知识女性的苦索冥求。《弃妇》借表哥之口表达了时代感喟:“如今我失败了,我一切的梦想都粉碎了!我将永远得不到幸福,我将永远得不到愉快,我将永远做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②而这牺牲者不论年龄大小,“你五十多岁了,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那知我二十多岁也是一样作了时代的牺牲者!”^③要解决这些冲突,就必须革命,而革命不是一日之功,所以,幸福愿望便只是个不能实现的梦,一方面肉体受着切肤的压迫,一方面灵魂也得不到理想中的安慰。急风暴雨、王纲解纽的思想文化变革并没有为妇女的解放准备充足必备的条件,当女性被男性启蒙者鼓噪着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时候,才发现社会并不能够给她们以栖身之处,社会也没有能够给她们提供可以获得经济后盾的职位,真实的性爱体验与现代性爱理念之间的落差更是她们所无法回避的,“现代性爱要求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但是当时的社会却连一个符合现代性爱理想要求的男性都没有为她们准备好,更不要说供给她们自由张扬个人主体性的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④。于是,她们或者忏悔以往的孟浪,寻求旧家庭的宽恕和重新接纳;或者就此投入另外一个牢笼,在从属于丈夫的家庭里做一个旧式的女子,找到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者干脆死亡、堕落……陷于苦闷、彷徨以至绝望的她们,在无所皈依和无可寻求中只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消磨残存的生命,抱定了“过渡时代的牺牲品”的观念,或在死亡的想象中,或在肉身的虐待中,或在疾病的自恋中,或在狂躁的消耗中,实现生命的尽早完结。

于是,有关生命长度、形态以及质量的潜意识设计,严重影响着她们生命的真实存在,从自恋、恋物、恋尸到恋死,对死亡情境的迷恋和构想成为其文字书写的主要意象。备受诅咒和戕害的身体不是那么容易被灭绝,她们一边进行自戕的描摹,一边享受着自虐的满足,在自我的注视下完成个体的自我牺牲过程。庐隐说:“评梅天生又有一种神秘的思想,她愿意自己是一出悲剧中的主角,她愿意过一种超然的冷艳的生活。”^⑤正如研究者所言:“她仿佛一厢挣扎于红尘扰攘中苦痛地呻吟,一厢又站在云端,艺术地观照和记录自己的悲欢。这样,半是命运捉弄,半是心生‘魔障’,石评梅以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势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之旅。”^⑥毕竟她们不能即刻消灭或者无视个体的生命之躯——肉体的真实存在,于是她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肉体的囚牢,自己同自己为敌,自己埋葬自己的青春生命,并在这埋葬中欣赏自己心造的崇高悲剧的幻影”^⑦,从而成为自己所排演的文学和人生戏剧的导演,实现心理的预期和自我的满足,并完成了表演者、观看者和书写者的三位一体。在一个倡导道德至上的社会中,个体幸福与外在道德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迫使人们不得不从真实感受的对立面进行道德上的倡导,通过反复的阐释和欣赏,最终认同那种外在于个体幸福的价值。于是,“是这个被社会历史塑造出的奇特影像,而不是天然自我欲望,真正令人们心醉神迷,这本身就体现了历史与个人最大限度的融合。人们在这一维度上进行自我呈现,不

① 庐隐:《胜利以后》,《庐隐选集》(上),第289页。

② 石评梅:《弃妇》,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159页。

③ 石评梅:《白云庵》,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第204页。

④ 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第247页。

⑤ 庐隐:《石评梅略传》,石评梅:《只有梅花知此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⑥ 黄红宇:《陨梅孤魂》,石评梅:《只有梅花知此恨》,第5页。

⑦ 刘思谦:《“娜拉”言说》,第74页。

可逃脱地成为‘表演者’”。^①庐隐、石评梅有幸成为这过渡时代的觉醒者和牺牲者,同时也不幸地成为这自我牺牲的表演者、观看者和书写者。如果将时代女性的牺牲比拟为一场演剧,那么,庐隐、石评梅就同时扮演着该剧目的编剧、导演、演员、观众等多重角色,在自我呈现和自我观看中完成了“过渡时代”女性牺牲过程的排演和记录。

四、结 语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②。先行者鲁迅提出的“历史中间物”概念成为“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时代话语符码,这一方面表达了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方生方死的万物诸象,另一方面也表明进化论启迪下时代精英的个体生命价值指认。“过渡时代的牺牲品”作为此一概念更加通俗和明确的衍生表述,体现出庐隐、石评梅等“五四”知识女性对时代话语符码的有效接受和认同,同时也昭示了女性在主要由男性所开启和引导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所付出的巨大精神牺牲和身体代价。

庐隐、石评梅是现代文学中比较早地将疾病、身体、爱情、死亡、革命等议题交织在一起进行书写的作家,不仅昭示了“五四”知识女性在启蒙时代的真实体验,也将引起人们对此后“革命+爱情”小说的更为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公共领域里的初次登场、成为注视焦点还是最后的黯然退却,以“身体”为依托的女性主体都不再是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历史的主动承担者。庐隐、石评梅藉此完成了关于自我的书写,而这书写也完备地诠释了她们自身。她们清醒地看到了身处的绝望和死亡,依然从容不迫地艺术地完成了她们自己。正是基于对“过渡时代”的高度自觉和坦然担当,她们的这一自我形塑过程更显悲情,也更令人沉思。

Self-shaping of Intellectual Women and Its Implic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A Study Centering around Lu Yin and Shi Pingmei's Novels

Wang Yanfang, Yu Di

Abstract: Facing their inescapable time, Lu Yin and Shi Pingmei, while possess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hared some common features in their literary expression. In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e mythic love and heroic dreams, they, as the pioneers of female liberation, suffered from loneliness and endless wounds. From self-indulgence, fetish, necrophilia, to masochism, and from the advent of female body in death narrativ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forbidden body and self-tortured psychology,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body upon the stage of the sacrifice, intellectual women, who were sandwiched between narcissism and masochism, have a way to shape themselves that finally influences the ways of the narrators' life and shows the lamenta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era.

Key Words: Transitional Era; Intellectual Women; Lu Yin; Shi Pingmei; Self-shaping

【责任编辑:陈 宏】

① 黄东兰:《身体 心性 权力》,第202页。

②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